

30 三十年集



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压在纸背的心情



Thirty Years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陈平原 著





Thirty Years

压在纸背的心情

陈平原◎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压在纸背的心情/陈平原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ISBN 978-7-309-07798-8

I. 压… II. 陈…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2337 号

压在纸背的心情

陈平原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孙 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5 字数 322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798-8/C·188

定价: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陳平原

承蒙复旦大学出版社好意，约我编“三十年集”。一开始是谢绝，原因很简单，没那么多好文章可选。199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跨世纪学人文存”，有我的《陈平原自选集》，选录刊于1984—1995年间发表的论文十四篇；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当代中国名家文库”，又有我的《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与都市想象》，选录1996—2008年间刊发的论文十二篇。这中间还穿插着香港三联书店的“三联人文书系”，其中有我的《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2008）——好在仅选四文，集中讨论学堂、报章、演说与“现代中国文学”之关系。作为学者，一年能有一两篇好文章已经很不错了，哪经得起这么编来选去。

改变主意，同意加盟，是因为出版社答应我可以不选论文，只选评论或随笔，而且着眼点不是“好文章”，而是“个人三十多年来的切身的经历、体验，独特的观察与思考”。这样一来，从“专业成绩”转为“学术观察”，那我有兴趣，也有把握。

三年前，《小康》杂志做过一个专题——《解读“后三届”：政治经济人文领域的中坚力量》，其中有我的自述：“跟我们的长辈很多在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酷打击或迫害相比，五十年代生人还是比较顺利的，但绝大多数也都曾经有过心灵的创伤，体会到人生的冷暖，在这种寂寞人生的苦难中逐渐成长起来。所以，这些人的心理素质比较好，抗打击能力比较强。”“我们的成长过程是伴随着这个国家的命运一路走来，一步步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当然，我们也参与到推动这个时代变化的努力中。”“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局面，给我们这代人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幸运儿。

也是为了纪念恢复高考制度3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永远的1977》，我在序言《未必“永远”的记忆》中提及：“本书的作者，尽管境遇和立场不太一样，但基本都是‘恢复高考’这一决策的直接受益者。这就决定了其叙述策略以及自我反省的力度。说全书弥漫着某种‘成功人士’的‘踌躇满志’，不算太刻薄。可这主要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文体的特性决定的——30年后‘追忆逝水年华’，很容易就

走到这一步。那些‘落魄江湖’的,或不愿参与其事,或因文章不合时宜而被淘汰,留下来的,必定偏于‘春光明媚’。”说这些,是为了提醒我的同代人,别太得意,回首往事时,多点悲悯与自省。

之所以将自家的“三十年集”题为“压在纸背的心情”,也是这个意思。放长视野,我们这代人的“阅历”、“观察”以及“心情”,或许比我们做出来的“学问”还要有意义。看一代年轻人如何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定定神,然后左冲右突,上下求索,还是挺让人感动的。后世的学者,训练、视野以及研究条件都比我们好,但读书时的心情、心气与心境,未必赶得上我们。有感于此,选择四十二则长短不一的随笔、序跋、对话或评论,勾勒自己走过来的学术道路,以及路边的野花野草、远处的好山好水,给近三十年中国学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

可真正操作起来,荆棘丛生。1978年春天进入中山大学校园,1984年秋天北上求学,这中间七年,忙着修课程,做作业,学写专业论文,没有适合入选的散文随笔。这也就罢了,我可以用“纪事”的方式,介绍那些年到底做了什么无关紧要的“好事”,发了多少未脱稚气的“论文”。问题在于,那篇刊于《人民日报》的“高考作文”,选还是不选,很是犹豫。我曾写过《永远的“高考作文”》(《瞭望》1992年38期),用自嘲的口吻提及此文给我带来的荣誉与苦恼。前两年还有人把这篇作文搁在网上,详细批点,好好娱乐了一番。我当然明白此文的毛病,可就像小孩子穿开裆裤一样,没什么好害羞的。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得以走进“八十年代的春天”。那就选吧,最后还是夏君一锤定音。

从1985年的“三人谈”起,每年选文一两则,这不难做到。请学生根据选目下载或转录所收各文,重读一遍,马上发现问题:有的内容残缺(如《“进化的观念”与小说史研究》),有的注释粗疏(如《独上高楼》),这还不包括删去“违碍”字眼的。终于想明白了,一是杂志自有体例,二是年轻人常常碰到的尴尬——被删节。这回不做添补,就照当年报刊登载的样子收录,以便存真。

按什么原则编排文章,一时颇费思量。如《学者的人间情怀》写于1991年4月,那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人,对学界前途以及个人命运多有思考。可文章经过一番审查与打磨,面世是在两年之后。考虑到当年情境,文章何时与读者见面并成为公共话题,远比个人心情更重要。因此,最后决定,此书所收各文,以发表时间为序。

依照丛书体例,需要撰写一篇万字左右的回顾性文章。可我想我就免了,因为,个人经历集中各文多有涉及,将《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好读书”与“求甚解”——我的“读博”经历》、《学者的人间情怀》、《与〈读书〉结缘》、《我的大学研究之路》等串连起来,约略可见这三十年走过的路,没必要再多费口舌。

在撰于 1992 年的《超越规则》中,我曾这样表述:“现代学术日趋精细,操作性越来越强,只希望学者不要完全舍弃忧生忧世的学术背景,以及贯串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人文关怀。”这也是我编此书的宗旨——关注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为自己,也为整个中国学界。从“高考作文”起步,一路跌跌撞撞,好不容易走到今天。有抱负,有收获,也有诸多遗憾,唯一聊以自慰的是,三十年来,一直在探索,没有过早地停止前进的脚步。

2010 年 11 月 14 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目 录

序 / 1

一九七八

大治之年气象新/1

一九八五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缘起/4

一九八六

文化·寻根·语码/12

一九八七

《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小序/17

一九八八

通俗小说的三次崛起/20

学术随感录/24

一九八九

“进化的观念”与小说史研究/34

读书人语/40

一九九〇

为人但有真性情——怀念王瑶师/43

未知死,焉知生/47

一九九一

学术史研究随想/54

也与武侠小说结缘/58

一九九二

独上高楼/63

超越规则/71

一九九三

学者的人间情怀/77

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83

一九九四

西乡铜像/96

一九九五

“当年游侠人”——关于黄侃/102

一九九六

“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109

世纪末的思考——遥想“九九”/112

一九九七

校园里的真精神/120

一九九八

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老北大的故事之五/139

无法回避的“1968”/148

一九九九

与《读书》结缘/155

二〇〇〇

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163

二〇〇一

北大人的精气神儿/173

北大边缘人/176

二〇〇二

“五方杂处”说北京/181

二〇〇三

书籍的艺术/197

“好读书”与“求甚解”——我的“读博”经历/205

二〇〇四

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图文书的崛起及其前景 /210

二〇〇五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225

二〇〇六

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广东历史文化行》引言/233

怀念“小书”/239

二〇〇七

我的“大学研究”之路/242

学问不是评出来的/250

二〇〇八

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252

请加入这道“风景”/258

二〇〇九

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261

走不出的“五四”? /269

二〇一〇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277

百年阳光,百年风雨/280

附录: 主要论著目录/284

一九七八

纪事

2月，远赴广州，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念书。此前，足迹未出潮汕地区。

4月，在《人民日报》发表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

大治之年气象新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伟大的祖国，迅速走向大治，条条战线凯歌高奏，捷报频传。在这大治之年，每天，都有许多喜讯激动着我的心。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受“四人帮”危害最严重的教育战线，也变得焕然一新，大有希望了。

不久前，我走访了我的母校。冬日的早晨，北风呼呼，寒气逼人。可是，校园里却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踏进校园，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广场两侧矗立着的两个专栏。左边那个批判专栏里，一篇篇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教育革命罪行的战斗檄文，像匕首，像投枪，直插“四人帮”的心脏。右边那个颂歌栏里，琳琅满目的散文、诗歌、美术，热情洋溢地歌颂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丰功伟绩，赞颂大治之年出现的新气象。突然，一幅题为《春满校园》的图画把我吸引住了。校园，在画面上占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作者腾出大部分的空间，用有力的笔触，浓烈的色彩，描画出一枝含苞怒放、绚丽夺目的杏花。这别具匠心的构思，可真引人入胜。欣赏着这枝杏花，联想到那“关不住”的“满园春色”，真叫人心旷神怡，情思驰骋。

“叔叔。”一个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回头一看，啊，是我的小邻居林强。只见他从自行车后架溜下来，拄着拐杖，朝我这边一拐一拐地走来。我忙迎上去，扶住他。前两天，林强为了抢救一个在公路上玩耍的小孩，左腿被手扶拖拉机撞伤了。我察看了他的伤势，接着便责备他：“医生叫你别来，你怎么还来？”林强眨了眨眼睛说：“不来，那怎么行呢？人家在学习，我在家休息，多可惜呀。有小刚用自行车载我，我能来。”

“铃……”上课预备铃响了，我搀扶着林强，朝教室走去。林强见我不理解他的心意，便说：“叔叔，前两年，在‘四人帮’的毒害下，我没有认真读书。现在，我要

三步并作两步，急起直追。时间，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啊。我常想，一天要是有一十八个小时那该多好啊！叔叔，您说，这个时候，我能躺在家休息吗？”听了林强的话，我感慨万分。一年前，林强还是个经常逃学、四处闯祸的“猴王”。可现在变了，变得真快呀。

把林强送进教室后，我便去找学校革委会陈主任。陈主任向我介绍了学校的简单情况，接着便领我循着琅琅的读书声，来到了高一(3)班教室门口。在那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老师正在讲解叶副主席的《攻关》诗，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记着。教室门口那张学生成绩登记表告诉我，同学们攻关取得了显著成果。

陈主任感慨地说：“这样的学习氛围，这样的学校新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是谁也不敢想象的。那时候，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被他们篡改的不成样子。我们这些被骂为‘臭老九’的，欲干也不能。那‘智育第一’、‘复辟回潮’的帽子压得人抬不起头，直不起腰。”陈主任点燃了一支烟，扬起眉毛笑了笑说：“现在可不同了。华主席为咱除了‘四害’，砸开了长期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枷锁——‘两个估计’。现在，我们可以大干了。同志们说，现在再不好好干，可就对不起华主席、党中央了。”

接着，陈主任又给我介绍了《春满校园》的作者魏老师的情况。魏老师年近六旬，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这两年一直在家休养。他正在准备办理退休手续时，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他拐杖一扔，立刻跑回学校要求参加工作。学校领导考虑他的身体情况，只分配他教几节地理课。可他却分内分外一起抓，经常帮助青年教师备课，最近又主动承担起辅导准备参加高考的同志的任务。大家都说，魏老师焕发青春，老当益壮了。

下课铃响了。在那洒满阳光的校园里，我和魏老师漫步、谈心。魏老师，鬓发斑白，面庞清瘦，精神矍铄，大概是因为熬夜，眼里布满血丝。当我要求他谈谈是怎样搞好教育工作的时，他摇了摇头，谦虚地说：“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一点点工作。”而当我俩谈起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图景时，魏老师的话可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流水，滔滔不绝。他说：“‘满目青山夕照明。’我希望自己能再活二三十年，亲眼看看四个现代化的美景。同时，尽我的最大努力，为党多做一点工作，使晚年放出更大的热。这样，当我一旦躺下的时候，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听了这一席感人肺腑的话，我不禁为这位老教师宽阔的胸襟、崇高的理想所深深感动。我明白了，我们的伟大祖国之所以能在大治之年突飞猛进，是因为有华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千百万像魏老师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忠诚党的事业的革命者。我深信，有这样伟大的党，有这样伟大的人民，任何

困难也阻挡不住我们伟大祖国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步伐。

看到这满园春色,我不禁又想起魏老师那幅画。当我问起那幅画的创作经过时,魏老师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出现的新变化,每日每时都在激动着我的心,逼得我不得不拿起画笔。也许有人会说,这校园并没花呀。可我说,那几百个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的青年学生,不就是几百朵向阳花吗?”

说得多好呵。何止我们的青年学生,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革命知识分子,不也是朵朵向阳花吗?他们,沐浴着党的阳光,开放在千山万岭,点缀着祖国的崭新气象,装扮着时代的美好春天。

原载 1978 年 4 月 7 日《人民日报》

一九八五

纪事

从1979年起,参与编辑中山大学学生刊物《红豆》,负责文艺评论部分。大学四年级时,与同学杨熙生合撰《论西方异化文学》,日后刊《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3年第1期,先是招来严厉斥责,后又莫名其妙地获奖。大学毕业论文分上下篇,《曹禺戏剧的民族风格》刊《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3年第4期;《论曹禺戏剧人物的民族性格》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后者入选《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982年1月,毕业于中山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专业为中国现代文学,导师: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三教授。1982年起参与编辑《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硕士生期间所撰论文,较有心得的是《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鲁迅研究》1984年第2期)、《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

1984年6月,毕业于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考取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王瑶),九月赴京就读。

1985年6月,与夏晓虹结婚,借参加学术活动之机,到大西北蜜月旅行。与黄子平、钱理群合作,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华文摘》1985年第12期;《1949—2009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文学评论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与黄子平、钱理群合作,发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六则(《读书》1985年第10期至1986年第3期),在学界颇有影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缘起

编者按: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人今年5月联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建议在文学史研究中建立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

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其他方面一起)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本刊拟围绕这个理论构想发一组谈话录,分缘起、世界、民族、文化、美感和文体、方法六篇,陆续发表,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和讨论。

陈平原:“思想史即思想模式的历史。”旧的概念是新的概念的出发点和基础。如果旧的概念、旧的理论模式已经没有多少“生产能力”了,在它的范围内至多补充一些材料,一些细节,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了,那就会要求突破,创建新的概念、新的模式。我们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也面临这种状况: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作家越讲越多,越讲越细。唐代文学三百年,我们才讲多少位作家?当然年代越近,筛选越不易。可是三十年的现代文学,拼命挖出不少作家来谈,总体轮廓反而模糊了。在原有的模式里,大作家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只好“博览旁搜”,以量取胜。你看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谈的作家很少,但历史线索很清楚。

黄子平:用材料的丰富能不能补救理论的困乏呢?如果涉及的是换剧本的问题,那么只是换演员、描布景、加音乐,恐怕都无济于事。

陈平原:所以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不光是一个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跟一些研究者提出的“百年文学史”(1840—1949),或者近代、现代、当代中国文学的“打通”,跟这些主张也有所不同。我们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进程来把握,这就涉及建立新的理论模式的问题。

黄子平:涉及“文学史理论”的问题。在我们的概念里,“二十世纪”并不是一个物理时间,而是一个“文学史时间”。要不为什么把上限定在戊戌变法的1898年而不是纯粹的1900年?如果文学的发展,到21世纪,它的基本特点、性质还没有变,那么下限也不一定就到2000年为止。问题在于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是不是从我们怎样形成这个概念谈起,这样也比较亲切一些,因为在文学史研究中碰到的困难、苦恼、危机感,大家都是相通的。

钱理群:我最早“切入”到这个概念是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我的题目是综合比较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从什么角度来比较?当时选取了好几个角度,最初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发现不行,太狭窄了;后来又从知识分子道路的角度考虑,还是不能够概括。最后是从列宁的话里得到启发,他讲到20世纪是以“亚洲的觉醒”为其开端的。我从这个角度来确定鲁迅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认为鲁

迅就是 20 世纪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个代表人物。

黄子平：“亚洲的觉醒”这里就已经蕴含了 20 世纪和世界革命这样一些概念了。

钱理群：对，我觉得，既然历史的大趋势和历史任务是这样，那么鲁迅毕生都是为了促使中华民族在现代的崛起，可以说他是 20 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巨人，他既是本世纪“民族魂”的代表，又是新的“民族魂”的铸造者。开头当然是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政治历史的角度考虑比较多，慢慢地意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方面。它可以把很多重要的问题“拎”起来考虑，逐渐形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东、西方文化撞击”的概念，找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历史坐标。另外一个感觉是搞现代文学史的人都普遍意识到的，觉得新时期文学和“五四”时期的文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是一个更高阶段上的发展。比如“改造国民性”的线索，就一直延伸到新时期，如果切断了，就讲不清楚。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是受李泽厚那本书的影响——

陈平原：《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钱理群：是我读研究生期间读到的感觉比较有分量的一本书。他里边提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时代中心环节是社会政治问题。我觉得这个特点从近代、现代一直延续到当代。尤其是对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文学的兴奋点一直是政治。这就显示出一个时代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对 20 世纪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许多根本的规定性是一致的。

黄子平：我是从搞新时期文学入手的，慢慢地发现很多文学现象跟“五四”时期非常相像，几乎是某种“重复”。比如，“问题小说”的讨论，连术语都完全一致。我考虑比较多的是美感意识的问题。“伤痕”文学里头有一种很浓郁的感伤情绪，非常像“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潮，我把它叫作历史青春期的美感情绪。文学中的美感意识，它是一个很内在的问题。美感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对世界的一种比较深层的理解。它跟一个时代的哲学、直观的经验、心理氛围，都有联系。美感的相像或者一致，它总是说明了许多问题的，至少其中蕴含的“历史内容”有相通之处。后来我做毕业论文的时候，考察新时期文学中的喜剧意识、悲剧意识和悲喜剧意识——

钱理群：你又追溯到鲁迅，追溯到“五四”时期的文学……

黄子平：我觉得一种现代的悲剧感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是古代文学所没有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往深里一想，就感到是由于一种共同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提出来的历史任务一直在要求完成，至今仍在寻求解决的办法、途

径。因为我们从小就学辩证法学得比较多,我就想如果把新时期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看作两个高潮的话,这之间是不是有一种——

陈平原:(笑)否定之否定!

黄子平:对,一种否定之否定的现象。既然它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那就带有一种整体性。可是我们的专业之间隔着一条杠: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就把这个螺旋给切断了。研究起来就有许多毛病。同时我又发现,搞现代文学的也好,搞近代文学的也好,都跟我们搞当代文学的一样,都各自感觉到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某种“不完整”,好像都在寻找一种完整性,一种躲在后面的“总体框架”。那么这种完整性是什么呢?开始只是朦胧的感觉,后来经过讨论,才一步步明确起来,它就是我们所说的“20世纪中国文学”。

钱理群:你可能主要从审美的角度考虑比较多……

黄子平:后来我又搞过一段文学体裁,即文体方面的题目,比如说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一下子又追溯到鲁迅那里去了,而且还不是“五四”时候的小说,而是他在1911年冬天写的《怀旧》。这篇小说虽然是用文言文写的,但完全是现代的短篇小说。无论从结构、视点、情绪各方面,跟当时世界文学的发展,跟世界短篇小说的趋势是完全“同步”的,这跟本世纪初他们周氏兄弟一块儿译《域外小说集》有关系。短篇小说的现代化至少从《怀旧》就开始了,一直延伸到现在,一条很清楚的线索。从文学艺术形式本身来看文学发展的整体性,我觉得更说明问题。

钱理群:小说形式我也注意过一段。当时王蒙提出小说观念的更新,引起很热烈的争论。我正在研究萧红,萧红不是提出过“小说学”的问题么?从萧红就一直追溯到鲁迅,鲁迅对现代小说形式的问题很早就提出一些精彩的见解。我就感觉到当代文学提出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问题——

黄子平:(笑)早已有之。

钱理群:这就构成一条历史线索,联系起来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它为什么会反复提出来,一提出来就还是觉得很新鲜?那就是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没有办法回避。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反复性强,文学史也是这样,来回折腾。我还想代你(黄子平)补充一点,你是怎么“介入”到这个概念中来的。就是你那篇谈《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的文章,是比较早从方法论方面提出来,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也要有一种“史”的角度,要从单纯的文学批评中跳出来,寻求文学研究的历史感。其实我们搞现代文学的是从另一端来接近这个概念的。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很不愿意搞纯学术的研究的——

陈平原:(笑)现实感太强!

钱理群：对，我们都是属于现实感比较强的人。要是把我埋在过去的事情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要是跟现实不相联系，那我们何必去研究它。我把这种研究叫做“从当代想现代”，就是从当代文学中发现问题，再追溯到现代文学去挖掘历史的渊源，是一种“倒叙”的思维方式。

黄子平：“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历史总是由现实的光芒来照亮的。

陈平原：从两端来接近这个概念：搞文学史的寻求一种现实感，与文学现实联系较紧密的寻求一种历史感。我听老钱说，林庚先生研究楚辞，就是着眼于“五四”新诗的发展来研究的，还有吴组缃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也是着眼于“五四”。这可能是北大的一个很好的传统。八一年的时候我跟黄子平通信，就讨论新时期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关系，我跟他说，他从“1919 看 1979”，我是从“1979 看 1919”，要研究“五四”那段时期的作家，没有感情介入是不行的，你很难理解他们。六十年前的事，多少有点隔膜。幸好我们也经历了 1979 年的一次思想解放，从“79”来看“19”，比较能够根据自己的体验，来理解“五四”时代的作家，理解他们的心态，他们为什么会写那样的小说和诗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苦闷、彷徨。

黄子平：那后来你怎样搞到“近代”去了？

陈平原：我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学，发现东、西方文化的撞击是一个大问题，很多现象都是从这里发生的。一系列的争论，比如“中体西用”啦，“夷夏之说”啦，“本位文化论”啦，“民族形式”啦，总是离不开一条主线，即怎样协调外来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矛盾。于是我就追溯中国人自觉地学习外来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开始是追溯到 1840 年鸦片战争，但是后来发现从学习“船坚炮利”转到学习政治经济法律再到学习文学艺术，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是到了戊戌变法以后，才开始全面介绍文化艺术。以前虽然承认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是毕竟“道德文章冠全球”。这时候才发现文学上也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文学观念开始转变。“五四”时期的许多问题，比如国民性批判，白话文运动，诗体解放，话剧的输入，等等，其实都是从戊戌之后开始的，尽管到“五四”才彻底、不妥协地掀起高潮，但是窗口是从那时打开的。而且，在这样的文化大撞击中对民族文化重新检讨重新铸造，使传统文学产生一种“蜕变”，这样的进程一直延续到现在，贯穿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当然达到这样的认识是我们反复讨论之后才有的。开始只是感到研究范围需要扩大，慢慢上升到一些新的概念，最后有可能上升到理论的模式。

黄子平：我写《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时，想到的是一个文学形象的问题。当时讨论得很热烈的是路遥的《人生》里的高加林，还有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